

晚清以来的官场小说一直备受指责,鲁迅先生就曾批判其“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近年来的官场小说热潮其实同样存在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问题,虽不乏精彩和厚重之作,但总体而言,官场小说在叙事模式、叙事伦理、价值评判等方面存在着高度的模式化倾向,看似繁杂,其实千篇一律,缺乏更为深厚和多层面的开掘。

比较而言,韩喜凯的长篇小说《累》则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认知经验和审美感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与韩喜凯的个人经历有关。他从基层干部到省级领导的从政经历,使他熟悉官场的种种法则。因为熟悉,他在小说中就不愿意刻意的渲染和夸张吸引眼球,因为熟悉,他在坚持起码的现实主义批判和基本的道德伦理的同时,才会对张立人等坚持原则的官员投以更多的同情,对他们的困惑和挣扎、妥协和坚守给予极大的理解。可以说,这种以同情和理解之心写出的官员身心之“累”,的确超出了官场小说的范畴。作品虽然也描述了官场的种种明规则与潜规则,以及复杂的为官哲学,但绝无渲染和铺张,更没有为了取悦读者而刻意描述黑幕与交易,而是把官场日常化,描摹普遍的人性与人心。因此,小说极少关注宏大的历史与社会变迁,也无意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但所传达出的人生之累及种种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生况味,却直达生活的本质与内核,读来使人唏嘘。从这个意义上说,《累》这部小说虽描写

长篇小说《累》作为对新的世情与官道的探究之作,让我们领略触目惊心的矛盾、纠葛甚至斗争,触及为官和做人的策略与底线,同时也令人深深地思考现实性创作的文脉和应该面对的基本问题。

古代小说常常依照说书效果而刻意简明地划分人物的忠奸、孝逆、诚信,伦理与事理的是非曲直评判也便一目了然。毕竟是后来人讲古,因而缩略式的点睛描画和简捷的道德论析也是在所难免。清末至近代,随着《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出现,现代“在场”的写作增多,给对情境与人的价值厘定带来了难题,尽量客观呈现而不是直接评断的写实态度于是得以通行,一时间也就造就了倾向含混的黑幕与趣味暧昧的风月之类小说的流布之势。事实上,单就官场小说而言,发展到今天,从人物方面看基本上仍然还是分为两种创作:一种是好坏特征明显的老说书体,读来倒是欣快,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在评书道剧情,自然没有多少精神压力;另一种则是更为流行的新搭配体,以丰富的变型人塑造为重,努力挖掘坏人身上好的层面、好人身上的缺点和弱点,最后你不知道该同情谁赞赏谁惋惜谁憎恶谁,再搭配一两位几乎没有血肉只有立场和权威、正面挺立的符号人,告诉你基层正义的力量得到了高层支持,终归胜利的结局,但你绝对记不住正义赋予者的姓名和具体形象。

——多年以来类型小说很难进入“文学正典”视域的原因就在这里。

仅仅回到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上面依然是不够的,这一切更应落到人之为人的典律上来。

主人公张立人,怀抱学有所用之志从县镇小吏做起,不乏由单纯清朗到虚与委蛇的经历,他每每在官场和人性挤压的峡谷行走,却始终为百姓和同僚求益避害。秉其诚,受其累,累是担当者必然的常态。但是他的为人与施政的自我要求始终明晰,“坚定但不固执,忍让但不软弱,活泼但不轻浮,谨慎但不胆小,果敢但不莽撞,自信但不自负,沉着但不寡断”。

红尘滚滚,沧海横流。历代世相浮华时期的人间都曾有此态,官场则是其中表情最生动、形状最繁复、机巧最诡异、命运最奇幻的核心地带。小说中的腐化人物群声色各异,从省委副书记到乡镇长,男男女女,裙带官商,关系繁杂,形迹混乱,尤其是对不正常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场游戏进行了集中而细致的描绘。但是小说中对张立人等有才能也有原则的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丝毫不逊于他们的对手。

邪恶势力排压而来的时候,张立人并不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独行侠。无论是张立人的母亲引经据典的开导,还是宋吉生的爽直分忧和刚正上告,还有张方平的同舟共济、李学珠的学者风骨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性情在作品里鲜活地体现着各自的生命价值,证明基层正当事者绝不单势孤。这一点,和我们在诸多官场小说、底层文学中常见的黑压压的官场中绝望无援的独行侠式的抗争有着鲜明的区别,也与单单指望自上而下轻易降落的大清官最后关头前来解围的模本有所不同。

完全可以这样说,《累》以人物为核心要素,并以此为基础,蓄藏着叙事结构上的智慧。作者执两用中,使文本在上层的强力和底层的涌动之间,用心传导出了基层的混响,发出了基层干部队伍扎实存在的正声,嘶哑中有清音,苦涩里有回甘。

“立人”之名,书中借学者之口解释为《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古训,显然不能全部用来概括张立人的性格。“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肃然起敬。”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话,张立人在局势最艰难的时刻想起,其实这正是信念的召唤。

“立人”又作为鲁迅那一代文人倡导的现代启蒙核心价值观,即所谓“尊个性而张精神”,百年来一直是现代中国的人格建设理想。张立人在曲曲折折的个性成长历程中,负累重重之下,在消磨个性的环境里不失自我的尊严,张扬了他所秉持的人格操守和岗位职责。这一形象,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和现代启蒙理念并非不可融合,两者的统一有助于现实性小说人物的丰满塑造,在这红尘滚滚遮望眼的现时代,同样适用于“官场文学”品质的提升。

社会世相中的人生之累

□吴义勤

官场和官场人生,但其内涵之丰富,已远远超出普通意义上的官场小说。

小说关注人性和人心的描摹,极力描写不同人物的复杂人性及精神潜流,并将其置于现实与理想、官场原则与价值立场、权力与欲望等矛盾、冲突之中,凸显人性的挣扎、救赎等复杂难题。主人公张立人作为上世纪80年代研究经济学的研究生,为“千番事业”,接受同学的邀请到乡镇工作,并从乡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直做到县委副书记,但其间的过程却千回百转,历尽波折。更重要的是,张立人作为知识分子,有坚定的价值立场和基本的处事原则,这与世故、圆滑、圈子化的官场格格不入,因此张立人虽有理论修养,政绩突出,深得百姓拥护,但始终无法进入核心圈子,还屡遭考验、圈套、排挤和利用。在官场法则和个人原则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中,张立人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逐渐“磨去了棱角”,并渐生退休之意。小说着重描写张立人在这种变化中心灵的痛苦与煎熬,既要适应官场法则,又决不放弃原则;既学习官场哲学,又时刻保持内心警惕;既维护政府内部的团结,又从不放弃抵抗;虽想隐退,但绝不放弃造福人民的理想。太多的不解、困惑、无助使得张立人“身累,心更累”。小说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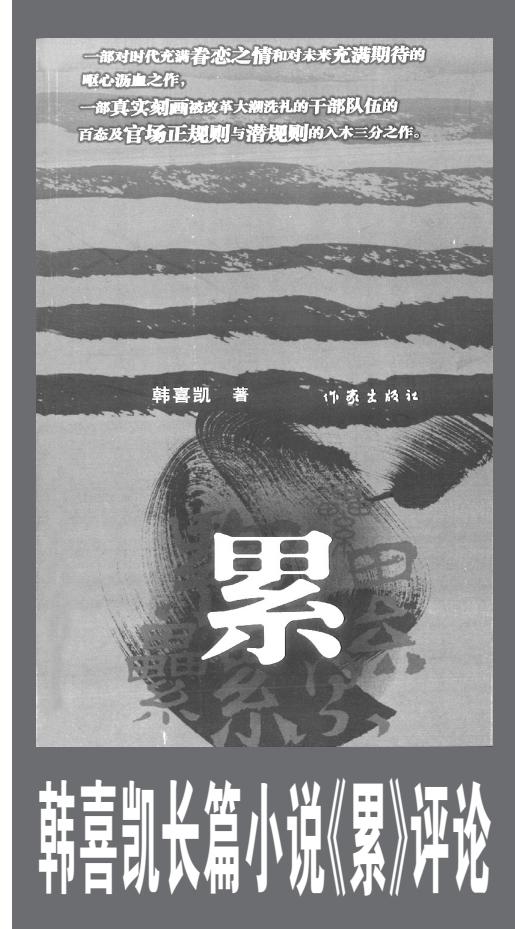
笔下的人物灌注了切己的关怀,其所塑造和呈现的人物内心世界丰富而立体。

同时,小说在刻画正面人物复杂内心的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同样注重内心的挖掘和不同人性、人心的展现。刘旭阳、裴尚蕊等人在小说中虽具有贪婪、无耻等一般性的特征,但因为作者注重对其各自内心描写,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反面人物的脸谱化。裴尚蕊靠出卖色相赢得仕途,但她仍然还残存羞耻之心,当需要她在张立人等人面前炫耀政绩、讲自己胜任县长的优势时,她感到“难以启齿”,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自己还真不如一直在农村,嫁个小伙子,不愁吃,不愁穿、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从服务员到县委常委,裴尚蕊不择手段,但也并非寡廉鲜耻,虽在官场如鱼得水,但其内心深处仍旧有着女性的柔弱。可以说,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并没有被简单化,而是同样呈现出复杂的神情图景。

小说值得关注的还有其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在小说中是异常尖锐的,但《累》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价值批判不是流于表层的现实控诉与批判,而是从道德伦理层面逐渐展开。这使得小说对现实的批判不是仅仅呈现为一种空虚和抽象的立场,而是具有了丰富深刻的伦理与人性

内涵。小说以精彩的笔墨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群像,并以普遍性的道德准则作为镜子完成了对人物的批判与审视。以张立人、张方平、宋吉生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具有道德、人格上的崇高追求。张立人追求“以诚立人,以忠立人,以正立人”。写黑信,搞诬告,在张立人看来是“不忠不信”、“缺德损誉”的事,即使是对陷害过自己的人,也是以德报怨,决不落井下石。而以甄振怀、田玉跃、刘旭阳、裴尚蕊为代表的官员,虽形色各异,但却普遍的道德沦丧。圈套、陷阱、交易、权谋是支撑其世界的基本符号。他们“四处作秀,十分得意,怎一个恣字了得”,他们冷漠、无情而又无耻。县委书记刘旭阳排挤张立人,张立人曾救过自己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们形成的圈子以利益做根基,表面上互相依仗,实则在利益面前是相互陷害。他们所依仗的省委副书记甄振怀在陷入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牺牲刘旭阳、裴尚蕊等人以保全自己。小说对这两种人物群体神秘心理的描摹极其细微,其言行举止被刻画得异常生动、到位、精准,义正言辞与色厉内荏、高尚与卑鄙,在道德和灵魂的天秤面前是水火不容,令人感慨。

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叙事平实而生动,节奏舒缓,值得慢慢品味。作者把从政的体验感悟和深刻的批判、切己的同情理解融为一体,虽写官场,却直指人生,惩恶扬善的同时,也让我们体味命运、抚摸灵魂并触及内心的脆弱。



韩喜凯长篇小说《累》评论

我们怎样与腐朽做斗争

□木弓

作家韩喜凯的长篇小说《累》是近年来反映我国反腐战线斗争生活的一部力作。小说以青年干部张立人的政治生活为线索,围绕贫困地区的泉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展开故事情节,描写了一张由腐败分子严密编织的官场关系网的那种复杂而强大的控制力,反映了一个正义与良知,责任与道德被严重扭曲的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揭露了那些无恶不作的腐败分子、利益集团的丑恶嘴脸,展现了当前我国反腐斗争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引发了我们对时代现实的深入思考。

现在反腐题材小说很多,但由于作家们之间思想认识和思想水平的差异,作品的思想质量也参差不齐。多数小说主要从猎奇或黑幕的层面上进行创作,所以情节曲折,故事抓人,但并不触及现实真实的矛盾冲突,把握不住问题的实质。更有那些所谓的“官场文化”,让先进的执政文化和政治生活文化真正于干部们的精神世界中,才那样容易形成一张关系网。小说没有粉饰“官场”,也没有进行全盘否定,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社会腐朽的东西正是通过“官场文化”让干部变质,让本应该“执政为民”的当代政治平台变成了利用职权谋私利的“官场”。所以,反腐败,也要清除所谓的“官场文化”,让先进的执政文化和政治生活文化真正于干部们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来。小说主人公张立人等一批优秀干部的心理精神变化正是这种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较量的结果。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其实也表现在与“官场文化”斗争的艰巨性。

看得出,小说作者对我国当代的政治生活非常熟悉,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因此,对我国当前的反腐现实和本质认识非常深刻——完全摆脱了一般同类题材小说的纠结困扰,而从国家执政和战略高度上去把握这个题材,构筑主题。在这个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上,小说敢于直面现实矛盾冲突,勇于思考探索,直接从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生活入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现状,看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是真实的世道人情,也让我们认识了真正的“官场”生活和文化。这样的作品,真实可靠。这样的作品思想,可听可信。这样的作品主题,才有思想的力量。

在小说具体的情节展现和细节描写中,我们看到了那种所谓的“官场文化”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害。主人公张立人从一个单纯的学生进入政治圈后的经历,表明了“官场文化”那种潜在的、对干部心理精神的腐蚀力量。进入这个规则以后,人性就渐渐发生变化,就渐渐失去了自我,变得可能无法认清自己。这就是腐败的土壤,这是一个本来很有抱负很有理想的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的文化环境。这里,小说显然做了一个最本质的区分——“官场”是腐败的土壤,但当代的政治平台并不是腐

败的土壤。“官场”与当代政治平台表面看上去是一种重合,但有着本质的区别。当腐朽的“官场文化”成为主导的时候,这个政治平台才会发生质变。中国确实有许多政治平台,变成了“官场文化”泛滥区域,所以腐败才那样轻而易举地进入干部们的精神世界中,才那样容易形成一张关系网。小说没有粉饰“官场”,也没有进行全盘否定,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社会腐朽的东西正是通过“官场文化”让干部变质,让本应该“执政为民”的当代政治平台变成了利用职权谋私利的“官场”。所以,反腐败,也要清除所谓的“官场文化”,让先进的执政文化和政治生活文化真正于干部们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来。小说主人公张立人等一批优秀干部的心理精神变化正是这种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较量的结果。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其实也表现在与“官场文化”斗争的艰巨性。

小说并不仅仅停留在揭露腐败分子丑恶嘴脸,揭示“官场文化”腐朽丑陋本质的层面上,而要引导我们更加深入思考。作品通过主人公张立人形象的塑造,显然向我们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腐败这样严重,但我们国家还是在发展,民族还是在振兴,社会还是在进步。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能站到世界平台上,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许多小说也写不明白这一点。在不少作品中,作家看到了真实的现状,却找不到出路,所以总是很消极。《累》显然不是这样。作家塑造张立人这个形象意在揭示出一个生活的哲理:并不是所有干部都战胜不了“官场文化”,或者说“官场文化”并非不可战胜。张立人、张方平等干部就是胜利者。他们心中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先进政治理念和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并不是什么反腐英雄,只是普普通通的正直的有道德良知的基层执政者。就他们的现状看,他们还没有条件同恶势力形成强大的对抗。所以只能在“官场文化”的泥潭里痛苦挣扎,迷茫无助,甚至被迫做出很多妥协,在当他们无法改变现实时,却能洁身自好,坚守道德底线,坚持为

百姓办事谋利,终于能突破困境,冲向光明。

一般人认为,张立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只能停留在作家理想中。其实,我们会说,张立人是一个理想型人物,也是一个现实的人物。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的力量。在张立人的背后,站着全中国的人民。人民的支持,就是我们战胜腐败、战胜“官场文化”的根本性力量。进而说到底,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并不是张立人有什么英雄壮举,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强烈意志和力量,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脚步。许多作品认识不到这一点,把人民看成是可以任意摆布打发的弱势群体。其实,就是这些弱势群体以他们的劳动改变着这个世界,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历史的本质,也看不到现实的本质,更找不到打破反腐难题的钥匙。长篇小说《累》比别的作品更有思想品质、更有思想力度的原因恰恰就在于比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因为有了张立人这样的形象,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思想格局就不同凡响了。

怎一个“累”字了得

□肖惊鸿

我一直以为,官场小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风行至今,之所以迅速升温且经久不衰,除了它以独特的视角、表现内容和审美取向迎合了大众的阅读心理,从社会意义而言,对推进民主、廉政等政治文明的影响虽有限,却多少起到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但从纯文学的本真意义出发,却乏善可陈。在模式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如王跃文的《官场春秋》《国画》,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阎真的《沧浪之水》,小桥老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在官场小说的泛文化意义上彰显了文学的应有之义,使得官场小说凸现峰回路转之势,以其深刻揭示政治文化内核、表现政治文明进程而成为当下现实主义力作之一。

《累》作为一部官场小说,其立意昭然,不必赘述。但《累》在官场小说中有它独到的特色和价值。

从生活出发,贴近现实,不生编硬造,不牵强附会。作者曾经是省级领导干部。他从一名小学教师到一名省级干部,有着几十年的官场生活经验。几十年的人生历练凝结成文字,付诸笔端。通常,对于非专业作家而言,积一世体验而为的小说,难脱自传或半自传的窠臼。我也曾试图从小说中找一找作者自己的身影。作者倾心赞美、着力刻画的主人公张立人,是作者心仪的我党执政者的完美形象。在这个形象里,蕴涵着现实的源泉和作者自己的从政体验。作者在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变换十余个岗位,经历过十余种不同的角色,这给他刻画、描摹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源,夯实了牢固的创作基础,使他得以把握官场百态,为刻画正反面人物做了充分的创准准备,也为这部小说增加了独特的价值。

塑造了官员的群体形象。泾渭分明,褒抑有理,刻画真

毫无铺垫,也毫无修饰,一个“累”字,径直作为小说的标题,我即刻就有了一种预感,这个“累”字一定凝聚着作者太多太多的感慨。读完全书,也就印证了这种预感。这是一部反映官场生活的小说。主人公张立人是一个县的领导干部,他在官场复杂的际遇关系网中周旋挣扎,最强烈的感受惟有一个“累”字。官场上的累,也许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累,不仅身累,而且心累,这是一种身心交织的疲惫感。我猜想作者韩喜凯一定是一位过来人,因为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是不可能把这种疲惫感描写得如此的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张立人在大学是一名学习尖子,研究生毕业时,导师希望他继续深造,但一位已经在基层当镇党委书记的老同学的召唤,使他做出了去社会大舞台锻炼的抉择。张立人这个形象具有广泛的典型性。因为随着执政党在任用干部上执行年轻化和知识化的政策后,越来越多的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进入到党政领导部门。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最初跨入党政机关大门时,多半都像小说中的张立人那样,满怀着理想和抱负,要干一番大事业。年轻学子之所以将从政作为实现理想的首选途径,也许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文人从圣贤之书中接受了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理念,并将入仕作为实践理想的方式。在张立人的理想中又何尝没有古代圣贤的身影,所以当他背着行李到基层报到时,看到玉米地里大片成熟的庄稼就会抑制不住兴奋,张开了臂膀,“把自己想象成一株向上蹿的玉米,根深深地扎入沃土,结出饱满的籽实”。然而现实并没有接受他的热情拥抱,他丝毫没有想到,他今后所走的路,是一条“很难适应又必须适应的路”。小说细入微地描写了这种“很难适应又必须适应的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张立人胸中的理想之光一点点地暗淡下去,有所作为的志气也一点点地衰落下去,一个心气旺盛的人逐渐被打得没有锐气、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这部小说可以说就是写了一个理想知识分子在官场是如何丢失掉自己的理想的,写了这个知识分子在丢失理想的过程中心理折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真实,真实地反映了官场上知识分子面临的尴尬处境。

官场在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年轻人的理想会在这里丢失。这的确是值得人们深究的问题。从《累》这部小说中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官场中存在着由利益编织起来的关系网。一个有理想抱负的人,一个正直清廉的人,每向前迈出一步,都会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困扰和羁绊。张立人来到的基层,就有一张这样的关系网。他的老同学田玉跃就是这张网上的

一分子。这张网一直连到县里、省里的核心权力部门的领导。事实上,田玉跃看上了张立人的才华,最初的目的也是想要把张立人拉进他们的这张关系网中。因为有才华的人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网编织得更加坚固。张立人必须摆脱这张关系网的羁绊,但他又无力撕破这张网,他的全部才智和精力几乎都花在了与这张关系网的纠缠上,他的理想和抱负不丢失才怪呢。

累,是官场普遍的心理症状。张立人、宋吉生、张方平等这些清正廉洁的干部会感到累,这是因为他们整天要与关系网周旋。而那些在关系网的庇护下胡作非为的贪官们同样也感到累,小说所写的田玉跃,就是这样一个贪官,他整天都在忙碌,但他的忙碌是为了达到各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通过田玉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贪官是如何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费尽心机的。他热情邀请张立人来基层工作,不过是看重张立人的才华。他正是凭着张立人的才华,在县委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大放风头,很快得到破格提拔。但是当他发现张立人不是他们这一类型的人后,马上把他踢开了。张立人与田玉跃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具有对比性的两个人物。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作者的用意。张立人是以立人为本,坚守理想抱负显然是他为人的基本原则;田玉跃中的玉字是欲的谐音,无疑是一个为了欲望而上下跳跃的人物。作者对张立人充满了同情和哀叹,也在揭露田玉跃本质的同时流露出对这个人物的惋惜之情。的确,田玉跃在大学学的是哲学,他有哲学的头脑,有着果敢的性格,他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但他一旦被编织进那个由利益纠集起来的关系网时,他的一切才干和“累”都成为了把他推向堕落深渊的反面力量了。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大连达沃斯论坛上发表的演讲,再一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特别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韩喜凯的小说《累》可以说是有力地回应了温总理的讲话。因为我们目前的领导制度还有不少缺陷,特别是不能有效地抵制营造关系网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党政领导部门自上而下都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网笼罩着,那么,像张立人这样有理想抱负、有才华的干部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还要时时提防着来自关系网的陷害;不仅要无奈地丢弃自己的理想,而且为了保全自身,只能降格到坚持“一厘米主权”的道德义务。张立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只能感觉到累。更重要的是,这种累,不仅累垮了优秀领导干部的身心,也将累垮党和人民的事业。“累”是官场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我们通过阅读《累》这部小说,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状态的严重性。我们期待着,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将想要有所作为的领导干部们从“累”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我想,这应该也是作者韩喜凯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之一。

小说中最高级别的反面官员是省委副书记、主宰干部命运的甄振怀,在书中堪称“万恶之首”。张立人的老同学田玉跃,是张立人投身社会的第一个直接领导,也可以说是他的官场领路人。这是一个被官场名利戕害了的基层干部的缩影。一路攀爬,假话、谎言、权谋、心术,尽于股掌之中。他的夫人梅芳,代表了官员夫人的群体形象,是官太太的典型。她爱慕虚荣,追求荣华富贵,利用她和丈夫的权势关系网,并和省委副书记甄振怀的公子勾结一起,沆瀣一气,最终成为金钱的爬虫,也成为社会的弃儿,走上了现实中通常的贪官出逃之路——逃往国外,躲避一时。作者还着力刻画了一名女干部裴尚蕊,凭借女色,从宾馆服务员一路攀